

共享骑行要驶入“循环经济”

■诸大建

时事聚焦

最近,摩拜单车推出全生命周期管理措施,开始替换耐用性弱的 Lite 1.0 版单车,让人眼前一亮。驶入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共享单车的本义所在,这样的改进符合发展趋势,有望对中国城市交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共享单车的问世,相对于原来的私人购买自行车和使用自行车,首先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即企业从销售自行车转换成提供骑行的服务,用共同使用代替私人拥有,在满足消费者使用需求的同时,控制物质拥有的总

量。这本身就是循环经济所追求的一种高级形式。当然,也有人质疑,今天国内的共享单车并非基于“闲置资源”的共享经济。其实,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不求拥有只求使用”,它既可以是基于闲置资源的 C2C 模式,也可以是基于产品服务系统的 B2C 的形式。前者对于私人拥有量已经很大的发达国家和城市有意义,后者对于基础设施和物质资源还在发展的中国城市有意义。中国的共享单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

共享单车问世以后,在北上广深的许多大学可以看到,大学生购买自行车的人少了,使用共享单车的人增加了,这对于用较少的物质拥有满足

增长的服务需求是有利的,符合生活效用满足要与物质消耗脱钩的要求。然而,共享单车的发展,只有商业模式的创新,没有制造模式的创新是不够的。如果资本把它当作逐利风口,催生过度投放,乃至造成“共享垃圾”,那么就与共享经济的初心相违背了。

共享经济的要义在于,有了初始的投放量之后,就需要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提高周转使用。这就需要基于循环经济原则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单车技术创新,包括在设计时选择耐用、可回收的材料,在运营时加强维护提高单车使用率,在报废时分门别类进行回收再利用再循环。目前,共享单车在全国投放已达 2000 多万辆,按

照 3 年使用期看,报废的高峰期即将来临。方此之时,共享单车平台企业推出全生命周期管理举措,具有示范意义。此举有利于建立更高的行业标准,推动中国共享单车进入以循环经济为目标的技术创新,提高共享单车的使用效率。

从更高的要求看,共享单车要真正为中国城市的出行变革作出贡献,还需要有公共服务治理模式的创新。过去 10 年间,公共自行车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版本。公共自行车 1.0 版本始于 2008 年左右,由政府用公共财政资金提供或者补贴提供有桩自行车,虽付出不少成本,但没能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今的共享

单车属于 2.0 版本,由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它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需求,但出现了骑行空间与停车空间的问题,需要政府在城市发展战略和空间安排上进行统筹。

共享单车未来的发展,需要进入公私合作的 3.0 时代。政府提供公共空间与管理,企业提供单车与服务,通过公私间的有效合作,为城市提供更加有序的公共服务,这样既可以满足老百姓的出行需求,又可以充分保障公共秩序。当这个意义上的创新完成后,中国共享单车就可以在世界上讲出一个有意义的、完整的创新故事。(来源:人民日报)



阻截“黄金时间”

时下,移动支付带给人们的便捷不言而喻,但也给不少骗子以可乘之机。有时防骗的弦一松、手一抖,不该转的钱就转出去了。近期,微信、支付宝均上线了延时到账功能,帮助受骗人亡羊补牢。

■新华社 朱慧卿

每个“假如”都是滴血的漏洞

■魏一骏 贾远琨

日前,浙江温州乐清市一名 20 岁女乘客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此时,距今年 5 月发生的河南郑州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案不过百日。愤怒之余,人们不禁要问:顺风车为何屡屡发生恶性刑事案件,滴滴的安全底线在哪里?

从滴滴自身的道歉声明、警方的最新通报回看此案,这个年轻的生命原本是有那么多的机会被挽留在这美好世界的……

假如前一天,滴滴能高度重视侥幸逃脱类似命运的女士的投诉,第一时间调查处置,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二天的惨案就不会发生。

假如案发时,亲友接到被害人发出的求救信号,第一次向滴滴寻求帮助时,滴滴能够第一时间报警,而不是以“将有相关安全专家介入处理此事,会在 1 小时内回复”搪塞,那么,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假如,在亲友们一次次向滴滴平台确认进展,滴滴不是一遍遍机械地回复“一线客服没有权限”“在这里请您耐心等待,您的反馈我们会为您加急标红”,甚至在一小时还差十分钟的电话里表示“一小时未接,请继续等待”,而是及时报警,那么,还在实施的犯罪仍有可能被中止。

对逝去的花季生命而言,每个

“假如”都是一个滴血的安全漏洞。在逝去的花季生命面前,滴滴事后给出的每个理由都是苍白和荒唐的。

近年来,除了乘客遇害这样的恶性事件,滴滴因平台车辆、司机相关证件不全而被处罚的事例不胜枚举。去年 11 月至今,仅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就已对滴滴公司做出行政处罚 244 次,处罚金额达 100 余万元。然而,对滴滴司机投诉难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屡罚不改甚至屡罚屡犯,折射出企业对安全底线和社会责任的漠视。

没有安全,何谈“顺风”? 逝去的生命,岂是道歉和赔偿能够挽回的? 对乘客生命安全的冷漠搪塞,不仅要受道义上的谴责,也应受到法律上的严惩。

8 月 26 日,滴滴出行公布了关于乐清顺风车事件的自查进展。然而,当悲剧重复上演,监管部门不能仅寄希望于企业自身整改,而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监管措施堵住漏洞。

网约车行业的发展为乘客提供了出行便利,但接连发生的恶性案件一再给这个行业敲响警钟——网约车企业必须把乘客安全置于首位,从一个个“假如”入手,坚决堵住滴血的漏洞,决不能让悲剧重演!

(来源:新华社)

别让“过度娱乐”淹没未成年人

■乔杉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起草的《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8 月 24 日起到 9 月 23 日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征求意见。《规定》提出,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规定中很多条目在广电总局的历年规定、通知中都有涉及,通过本次征求意见,有望形成系统性的法规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并实施。

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里写道,担心社会公共话语权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片化,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娱乐节目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当然,社会是丰富多彩的,娱乐有其大量存在的理由,可当娱乐走向过度娱乐时,特别是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带来的其实只是一种表情。

在泛娱乐化的潮流中,很多人主张对事物和人物不作评价,尤其是不要作道德价值上的判断,他们认为毫无必要,没有意义。但在事实上,任何一种流行文化,都不可避免带来道德上的影响,未成年人节目更是如此。“少年强则中国强”在过度娱乐化下,会有普遍的“少年强”吗?或者说,过度娱乐化会培养出有希望的一

代吗?

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揣度未成年人节目的制作者,包括那些过度娱乐化的节目制作者,也未必想提供精神鸦片,想毒害一代青少年。有的时候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可能的后果。而且更多时候他们为了流量,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有的人认为,观众就喜欢低俗、欲望、单纯感官刺激,而且在这方面做文章相对容易,所以才一头扎了进去,甚至用“尊重市场”“尊重需求”来自欺欺人。

确实,文化也是一种市场,也应该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可是,市场规律到底是什么?需求就真的压倒一切吗?在文化消费上,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提供了什么他可能就接受什么,甚至成为一种潮流,更多人只是在盲目赶时髦,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需求与欲望都应该得到满足。这也提醒文化从业者,在制作娱乐节目,特别是制作未成年人娱乐节目时,也要讲价值观。价值观重要的不是教你做什么,而是让你知道有什么不能做。

习主席在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其实,如果能够选择,大多数

制作者还是想“站着挣钱”,名利双收。他们当然也想做出类似诗词大会这样的既有口碑又有金杯的节目,只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能力危机、原创能力不强、底线意识不够,导致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通过低俗、欲望和单纯感官刺激来吸引流量。说到底,这其实不是“娱乐”,而是一种“愚乐”,是以一种愚蠢的方式,来吸引和刺激低级的快感。

更值得思考的是,当未成年人节目也出现严重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时,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文学界谈论一个作家的文字尺度,经常问一句:你的文章好意思让你孩子看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节目。很多制作者其实也不好意思让孩子看自己的节目,也担心节目呈现的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会对孩子成长造成影响。只是在一个无节操世界里,你在毒害别人的孩子,别人也在毒害你的孩子,其实是精神领域内的隔代“易妻相食”。

过度娱乐化的实质是一种“愚乐”。大量的“愚乐”节目并不是文化繁荣的标志,反而是文化创造力不强的体现。不能让“过度娱乐”淹没未成年人,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责任。

(来源:北京青年报)

高学历与低规则感

■刘白

高铁上的“座霸”视频,最近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刷屏。主人公孙某随后被曝出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掀起了二次传播的热度,给近期社会新闻舆论场,带来了又一个全民参与话题。

同样在交通工具上,主人公同样是高学历,8 月 24 日的另一条新闻也颇耐人寻味:“因不肯系安全带,广州一大学生把长途客运司机推翻在地。”据称,被打司机年纪稍大,倒在过道上,爬不起来。等车上乘客报警,打人大学生才赶紧道歉,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要是被带到派出所,“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却要留下污点”。

社会新闻用书面语陈述,往往会遗漏那些微妙而重要的信息。能看到“座霸”博士的微妙表情与小动作——“我就是理”的嚣张,“我在戏耍你”的快感;也能感受到打人大学生用肢体动作传递出来的情绪——“为什么我要服从规则”的不满,和“一定要给你点教训”的底气。知道主人公教育层次的人再看这些视频,可能会别有一种惊讶。

仅以两个个案为基础,就形成对一些高学历人群的某种判断,当然是不合理的。看过这样的新闻,人们产生“受过高等教育怎么反而这样”的

追问,却是自然的。

高铁、机场、长途汽车,因为涉及到人身安全,往往也是公共场合中规则最为刚性的地方。但恰恰是这种既有充分法理情理基础,又意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规则,触怒了高学历的人。高等教育如何普及规则意识、如何讲述群己关系,其所产生的实际引导,是知识越高的人越要模范遵守规则还是知识越高的人越有凌驾于规则之上的能力,甚至,凌驾规则的能力反而证明了高阶层和高智识?答案在以上新闻中或可窥一斑。

在对社会文明度的推进上,也存在一种头雁效应。即,精英阶层和高智识人群既能极大影响人们对现状的判定,又能实际起到对整个社会的示范和提拉作用。更具体地说,对社会文明现状的反映,越是博士、越是高学历,反映得越真切。“座霸”博士、闹机场博士、因不肯系安全带就使用暴力的大学生,只代表他们自己,但他们身上的标签,却能影响社会预期。也因为这种影响,我们有必要从个案中导出可能存在的真问题,来进行教育和社会生态的矫正。

反端知本,这些,恐怕并不算过度反省。(来源:光明日报)